

加强“两通”开发 活跃城乡交流

李崇准 肖国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的经济迅速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过程。如何发展商品生产?看来狠抓“两通”,活跃城乡交流,应该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重要战略,而各种类型的大中小城市应该在这个战略中起着枢纽作用。

一、商品生产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下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 商品出售成为决定性的事情:马克思曾科学地指出:“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①“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②今天,在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前提”、“决定性的事情”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粮农已经发生“卖粮难”,果农已经发生“卖果难”。不少地方粮食生霉,水果腐烂,鲜奶变质,鱼虾发臭,数量大得惊人。在农产品收购旺季,商业部门由于收购人手不足,仓库有限,运力不够,管理不善,经常发生收不了,存不下,运不出的现象。

(二) 不仅卖难,买难的现象也很严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买不到化肥、农药和柴油等生产资料,随着林、牧、副、渔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需要生产资料的种类也多了。农民逐渐富裕起来,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由“有吃、有穿、有用”发展到要“吃好、穿好、用好”,还要求“住好、行好”。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讲究“住处要宽敞,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用的要高档”的情况。但农民所要的东西却常常买不到。

(三) 市场信息成为发展商品生产的关键:农村粮食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农民在粮食做到自给有余以后,发展多种经营是必然趋势。发展什么商品?农民不仅需要“一年早知道”,而且需要“几年早知道”,如果当年畅销的,次年可以变为滞销;当年滞销的,次年可以变为畅销,农民就莫知所从。特别是多年生的农产品,种下去后,如果将来发生销路问题,就后悔莫及。广西前些年发展棕片生产,广植棕树,后来棕丝、棕绳被化纤制品代替,农民吃亏不小。去年以来,湖北将棕片用于做沙发芯、床垫,销路大畅,这个信息就需要传给广西。因为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气候炎热,不需要床垫,沙发也不太时兴,棕片广西不销,可以运到湖北销。

(四) 要求运输、仓储跟上去:去年山东苹果丰收,火车车皮不足,苹果不能及时运出,车站附近,篓装苹果堆在露天,任凭日晒夜露,损失很大。特别是山区的土特产,由于交通运输不便,运不出去,浪费惊人。

(五) 农业劳动力不断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要寻找新的出路。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商品率提高了,有钱可以买到粮食。有了粮食,就有了离开土地的条件。过去,农业劳动力离不开土地,形成八亿农民忙吃的局面,就因为粮食过分紧张。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粮食这个最重要的必要生活资料已超过历史最高产量,粮食商品率有

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征购粮食的比例，历史上最高占粮食总产量的20%，而1983年上升到24.5%。特别可喜的是：重点产粮省商品粮调出的数量，与历史比较，成倍或几十倍的增加。粮食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民把粮食做到自给有余，就有可能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就有条件务工经商。二是由于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必然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转向林牧副渔，发展各种商品生产。农民不仅务农，还要求务工经商，很多行业都将应运而生。农民的小型工业、家庭手工业、建筑器材、食品、饲料、山货加工、运输、贩运、储藏、信贷、咨询、信息、商业、服务业，等等，都会迅速发展。

(六)要求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品。农业的发展，使农民尽快富起来，必将推动工业的巨大发展。八亿农民的市场按人口来说，等于八个日本市场。化肥每年需要数千万吨，化学农药每年需要几百万吨，拖拉机每年需要几十万台，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也大量需要。如果到2000年农民达到小康水平，每年可能有上万亿元的购买力投向市场，这对工业生产将是巨大的挑战。农村这么大的市场容量，自然要求不断扩大工农产品的交换规模，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已经从集市贸易市场上初步显露出来，集市贸易已经从农民调剂余缺的场所，发展成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补充渠道，已经从农副产品的交换场所，发展成为工农产品综合交换场所。

综上所述，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要求打开销路，寻求市场；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多，要求广开就业门路；农民购买力大幅度提高，要求扩大工农商品交换的规模。这些新的情况，都向商品流通提出了新的任务，也就是说，要求大力发展商品流通，扩大城乡工农产品的交流。

二、商不挂帅，工农两业不会发展

要使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发展，不仅要发展商品生产，这已为许多人所认识。但对大力发展商品流通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搞活农村经济，关键不在生产领域，而在流通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而且一定要大力发展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不发达，各地的优势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面向当地的商品生产，这是必需的，但这毕竟是扩大了自给经济。只有扩大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城乡之间的工农产品的交流，才能真正发挥本地的优势，增加本地的收入。北方盛产苹果，一斤苹果在产地只卖一、两角钱，运到南方销地可卖五、六角。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③。商业的发展固然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强有力的促进者。商业和服务事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行业，这一点必然愈来愈明显。商业不挂帅，工农两业不会发展，当前农村的现实情况正是如此。

我们知道，商品生产是为交换而生产，并非产品生产。商品如果卖不出去，它的价值不能实现，它的再生产就无法进行。因此马克思把商品的出卖说成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④。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表述，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分为流通过程（供应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产品销售）。三个过程中有两个是流通过程。按照这一过程的表现形式，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顺序应该是供、产、销，而不是产、供、销。习惯上叫产、供、销，是重生产，轻流通的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流通仍处于“三分之二”的中介地位，要把农村经济搞活，非抓商品流通这个“大头”不可。不然，工业与农业联系不起来，城乡之间联系不起来，地区之间联系不起来，生产与消费联系不起来。商品流通不发达，市场范围就不能扩大。市场不能扩大，

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就会遇到销售和购买的困难。因此，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

在大力发展商品流通的同时，一定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当前交通运输不畅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不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严重影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

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城乡交流，关键在于加强“两通”的开发。所谓“两通”，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交通(包括运输和邮政电讯)和流通(包括商流、物流、钱流、信息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必要环节，是商品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商品流通好比人体的血液，交通运输好比人体中的大小血管，是商品流通的运载工具和渠道。而中心城市却好像人体中吞吐血液的心脏，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起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它们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果血流不畅，人体就会生病；如果“两通”堵塞，商品生产就难以发展。因此，要发展商品生产，就要开发“两通”；要促进城乡交流，也要开发“两通”。于是“两通”开发，就成为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如何加强“两通”开发？

(一)要放宽政策。过去对商品流通统得太多，管得太死。今后应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放宽政策，才能活跃流通。这在当前来说尤为重要。首先是产销关系要放开；纳入国家计划的农产品品种，应当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商品供求的变化而逐渐减少，要扩大议购议销商品的范围。各种国家计划产品，都应当留一定比例给予生产者和生产地区自行处理，使他们感到自己确是商品的所有者，有相对的独立权利。对三类农副产品尤其要放开搞活。要按照赵紫阳总理讲的那样去做，真正做到“把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小的方面放开，主要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和运用经济杠杆加以制约。”^⑥但在行政管理与经济杠杆之间，要尽量少用前者，多用后者。二是经济形式要放开；国营、集体、个体都应有多种层次的组织结构，在保证国营商业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这是很适合我国国情的。国营经济有中央管的、省管的、市、县、镇管的，企事业管的各种商业。集体经济有小集体、中集体、大集体、有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商业，供销社就是高级的大集体商业。除城镇适当发展个体商业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务工经商。三是地区之间商品交换要放开；必须打破城乡封锁、地区分割、筑墙垒坝、堵塞流通的局面。各条渠道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按照经济区划合理布置商业网点，允许长途贩运。四是价格政策要放开；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活动范围，把三类产品和完成统派购任务的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允许国营商业、供销社灵活掌握购销价格，以便参与市场竞争和调节。要尽可能让价值规律发生作用，只要国营商业掌握大头和主动，商品供应量不断增加，价格就不会乱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并不是不会经商，而是价格规定死了，它们不能相机行事。

(二)改革商品流通体制。要改变流通领域中管理体制过去那种机构重叠，婆婆多、层次多、环节多、人为障碍壁垒多和批零网点少，流通渠道少以及商品流向不合理(如迂回运输、绕道运输和反向运输)等状况。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在以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内，组织起不同层次的商品流通网络，建立相应地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渠道并存的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为此：

(1) 要加强国营商业、供销社主渠道的经营，让农产品能进城，工业品能下乡，真正做到城乡通开，地区通开。要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搞联合，做到平等互利，调剂余缺，利益均沾，风险共担。

(2) 国内商业不仅要立足国内，还要面向国际市场，让某些可以赚外汇的和国内销不掉的产品，可以运往国外销售，同时也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来装备国内的工农业。加强国内外贸易的结合，使对外经济贸易部与商业部所属系统能够紧密合作，要改变国内一块板，对外贸易一块板，这种“两块板”的贸易状况。

(3) 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民自己的集体经济，成为真正的合作性质的商业。把供销社与农民的利益捆在一起，使农民真正关心供销社的经营活动。要让供销社真正做到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想农民之未想。恢复和发扬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的优良传统，使供销社成为城乡经济的纽带，农村集镇经济的组织者。

(4) 多方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个体工商业。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农村个体经济的特点：他们经营分散，面广点多，需要资金少，设备可以因陋就简；他们的进货关系多，销货门路广；他们单纯经营少，半农半商多，半工半商多；他们购销兼营，流动性大。要允许农村个体经济综合经营，不要单纯强调经商，这样经营成本低，也方便群众。允许农村居民从事适合个体经营的工业、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房屋修缮业，以及国家允许个体经营的其他行业。要允许农村个体商业长途贩运，要改变歧视“弃农经商”、“弃农从副”、“二道贩子”等旧的看法。要改变对贩运者什么赚钱就贩卖什么是投机的看法。应该看到什么赚钱贩卖什么，这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贩卖者的动力所在。贩卖者之所以能赚钱，主要是市场上供不应求，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贩卖者异地运输，调剂余缺，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只要不违反政策规定，应当受到保护。要承认个人贩运也是社会分工的一种必要劳动，运输是生产的继续，“二道贩子”不是投机倒把。只有违法经营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才算投机倒把。

(5) 发展小商品市场。要发展大、中、小城市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小商品市场，以个体经济为主，以经营小商品为主。为街道工厂、社队企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以及一部分国营企业的滞销品、二等品、副品开辟销售渠道，为农村个体商贩提供进货场所。在城市和集镇中还应多设小型的日用杂品网点。日用杂品号称“土百货”，与城乡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虽小，作用重大。这些小商品应该是价格便宜，经济实惠，适合当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消费水平的。办好小商品市场，既要办好日用工业品，又要办好“土百货”，小商品市场的门类还应大加开辟。这样，既有利于促进小商品流通，又有利于满足人民需要。

(6) 既要继续发挥城乡集市贸易的补充渠道作用，还要改革商品批发体制。目前批发体制的主要缺点是：条块束缚多，因行政需要而设置批发机构，而批发的门类少、网点少。无论在数量上和经营上都担当不了日益发展的商品流通中介业务。要打破条块束缚，广设各种行业的批发网点。不仅在大中城市中要逐步建立起农副产品的批发交易市场，还要在产品集散中心的县镇设置批发机构，尽量使产销见面，减少流转环节。国营商业的工业批发，要在国营商业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按照商品的合理流向设置批发机构，开展购销业务，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砍掉不必要的流转环节，缩短商品的流转过程。各种批发行业，还可兼营旅社和堆栈业务，以供商人旅居和堆放货物。总之，要尽量做到多渠道少环节，以利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使货畅其流。

(三) 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在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在中心城市应

该组建贸易中心，组织各业商行、货栈、行会、交易所、信托公司、商品展销会、博览会，等等，以发挥商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大力发展各种服务行业，如：旅社、饭馆、保管、包装、码头车站搬运，电讯和车船票服务处、各种修理行业、理发、洗澡、娱乐场所、旅游设施等，以便利商旅活动。还可利用中心城市在生产技术、科学教育、信息传递、咨询和管理人才集中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知识行业，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

(四)要大力发展城乡之间和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交通运输事业方面是很重视的，把它看成是“先行官”，在基建投资方面，列为重点。不过，过去我国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水陆空的主干线方面，虽然主渠道有了加强，而干渠、支渠、毛渠没有同步组建，未能成龙配套，交通运输仍然运行不畅。今后，主要干线方面的工作无疑还要加强，特别是在改善“卡脖子”的重要地段的运输条件方面更要加强。还应增加火车车皮、汽车车辆、商船和飞机的数量和改善经营管理，并搞好水陆交通主要干线的配套设施，如港口、车站、码头、机场、仓库以及冷藏、装卸等等的建设。除此以外，今后还要：

(1)以中心城市为枢纽，建成水陆交通和大小公路的网络。要修桥补路，修通“断头路”，打破条条块块，形成跨省、跨地区的交通网络。力求直线运输，避免绕道行驶。公路网点要能深入到农村、山区，做到四通八达，无远弗届。

(2)要特别重视水运，因为水运成本最廉。除整治长江、黄河航道外，还要大力发展内地江河湖泊航行的便利，建造大量小机动帆船和驳船。有条件的话，还可多造一些江轮和海轮，以利通江达海。

(3)要大力发展邮电通讯事业。特别是电话，要尽量普及。邮电通讯事业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沟通城乡、地区、产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主要桥梁。邮电通讯事业不发达，信息不灵，商业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就不能因势利导、补缺泻余、穿针引线，使货畅其流。反之，如果邮电通讯事业发达，则可大大缩短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减少时间上和空间上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浪费，从而提高各行各业的经济效益。

(4)“商”“交”紧密结合，大力发展联运服务。要开展直达运输，抓好货源、运力、装卸和仓储等环节的结合。发展水陆联运，铁路、公路、水路三路的合作联运，干支联运和江海联运。搞联运配套，一通到底，全面服务，全程负责。开展联运服务，我们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优越条件，只要不搞部门分割，是有条件组织社会化大协作的。这样做，既能加速商品流通，又能减少空驶，对货主、承运方都有利，是一种迅速方便，多方有利的东西，值得大力提倡。

(五)金融工作要跟上去。商品流通的过程就是商品和货币相互交迭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流通的过程。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货币流通量将会大大增加。现金的收付，储蓄的存取，资金的融通，异地的汇划和转帐结算等工作必然日趋频繁。这就要求中心城市的金融机构和农村的金融网络、特别是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工作要跟得上这种形势的要求。金融工作可以在引导商品生产方向、调剂资金余缺、提供灵通的经济信息、为产销穿针引线、促进商品交换和物资流通、监督资金的使用，增加资金的积累，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要使它活而不乱，搞好金融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下转第33页)

史竞赛中取得优势,阻止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竭力发展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需要新技术挽救传统工业,开拓新型产业;超级大国争霸斗争越演越烈,军备竞赛的加紧,军火贸易的丰厚油水,使生产中采用科技最新成就成为绝对必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原有的基础比较雄厚,发展科学技术的客观能力比社会主义国家强,科学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大。从这些原因看,战后,特别是5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否定,而且恰恰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进步在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主导作用。

列宁指出:“生活由于矛盾而前进”。^⑩历史辩证法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刺激科学技术发展的种种因素将在发展中逐渐消失,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时代社会进步的高峰,它在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中,对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显得特别具有创造性力量。我们深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三十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注释:

①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8、4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16页。

⑦ 《列宁全集》第1卷,第8页。

⑧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109页。

⑩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9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⑫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

⑭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4—595页。

⑮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535页。

⑰ 转引自(苏)阿法拉西耶夫主编:《科学共产主义基础教程》。

⑱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219页。

~~~~~  
(上接第11页)

(六)此外,还要重视“两通”方面的智力投资,采取多种层次,多种方式的办学方式来培训“两通”的干部,使它们懂得有关的理论、政策、技术和管理方法;以便更好地把“两通”工作搞上去。

总之,抓好“两通”这个联系生产和消费之间、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使货畅其流,将有助于实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这样,商品生产从而整个国民经济是会得到迅速发展的。

注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3,49页。

③ 《商业词汇》,中国财经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4页。

⑤ 赵总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第68页。